

中国近代生物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

付 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清朝末年主要是传教士在译介西书的时候注意到名词统一的问题,并开始有所实践。益智书会以及后来的两个名词审查会作为民间力量,在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方面影响深远。清学部的编订名词馆和中华民国国立编译馆作为政府部门,分别在不同时期参与或领导了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社团在生物学名词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物学的发展、官方力量的介入都是生物学名词统一的必要因素。

关键词:生物学名词,审定,统一

中图分类号:N04;Q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3-0052-06

Approval and Unification of Biology Terms in Modern China

FU Lei

Abstract: Missionaries paid attention to terminology unification and began to practi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the General Committee for Medical Nomenclature and the General Committee fo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made great impact on the approval and unification of biology terms. As govern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rticipated or led this work in different time.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and other scientific societies played important role. For unification of biology terms,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y and the involvement of government were essential factors.

Keywords: biology terms, approval, unification

引 言

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传入中国,在明末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比较著名的著作有传教士邓玉函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

等。但当时毕竟是起步阶段,传教士的翻译水平很有限,传入的著作也很少,生物学名词主要是人体解剖方面的,尚未涉及名词的审定统一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西学东渐高潮来临,大量的西方生物学著作(包括很多教科书)传入中国。

收稿日期:2014-01-10

作者简介:付雷(1982—),男,山东肥城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生命科学史。通信方式:ful527@163.com。

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有的是由传教士独立完成的,有的是由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合作完成的,到了后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学者才开始大规模地独立翻译。而这些生物学著作,特别是教科书的引入,又经历了一个三阶段的发展过程:19世纪中后期以西方著作为主,20世纪初期以日本著作为主,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中国学者自己编写和引进西方著作为主。本文关注的,主要是近代以来,西方生物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相关名词的审定统一工作。

一 清末生物学名词的翻译与统一

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大量西方著作传入中国,名词的翻译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通常译者在书末附上中英文名词对照表,以方便读者参考。然而,由于不同的译者翻译名词的原则和方法不同,会出现一词多译的混乱局面,令人莫衷一是,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名词统一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最初传入的生物学知识,大多以医学或博物学的面貌出现,而对于生物学名词的翻译统一,就显得非常零散。

清末的生物学知识有一部分是通过传教士直接介绍到我国的,他们一方面创办报刊、译介西方书籍,另一方面兴办学校、编写教科书,这都涉及译名的问题。早期传教士的译名也不统一,直到1877年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成立,才将译名统一作为重要工作。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被聘为益智书会的总编辑,负责教科书的编写。1890年益智书会成立出版委员会,傅兰雅为秘书,负责译名工作。1896年成立科技术语委员会,由狄考文、傅兰雅等人组成。由于傅兰雅于1896年赴美,这个委员会在名词统一方面成效甚微。1902年狄考文、潘慎文、赫士等人编成《术语辞汇》(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1904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该书词条达12 000余条,包括一些动植物学、生理学、解剖学、药学等名词。1910年师图尔对《术语辞汇》进行修订,由监理会书局再版。修订后的《术语辞汇》删除了大部分医学名词,增补

了一些生物学名词^[1]。

国人也积极参与到译介西方科学书籍的行列中,但是初期都没有注意译名的统一。江南制造局于1867年设立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著作。傅兰雅被聘入翻译馆主持翻译工作。在生物学方面,据傅兰雅统计,该馆已刊成博物学著作6部计14本。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于科学名词的翻译十分重视,有一套翻译原则与方法,并制作了“中西名目字汇”,要求译者在“译书时所设新名,皆宜随时录于华英小簿,后刊书时可附于书末,以便阅者核察西书或问诸西人。而各书内所有之名,宜汇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2]。后来傅兰雅利用益智书会统一名词机会,根据历年积累的名词,通过江南制造局刊行数种《中西名目表》,其中包括《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其中有一些动植物名称的中英文对照。不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并没有完全按照傅兰雅设想的来翻译西书,馆内译书名词仍未统一。

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1906年学部下设编译图书局,负责编译中小学教科书;编译图书局下设审定科,负责名词审定。1909年10月,学部奏请设立编订名词馆,专门负责名词翻译与统一工作。这个机构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编订名词馆,自上年奏设以来,于算学一门,已编笔算及几何、代数三项;博物一门,已编生理及草木等项;理化、史学、地学、教育、法政各门,已编物理、化学、历史、舆地及心理、宪法等项。凡已编者,预计本年四月可成;未编者,仍当挨次续办。”^[3]在生物学名词方面,现存《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①,只是未来得及颁行^[4]。学部编译的教科书无法满足当时全国学校的需要,只好允许各地编译出版,只是要送给学部审定。对于教科书中的科学名词,学部明确要求“科学名词,各书未能一律,暂仍其旧。俟本部编订名词书成后,再通行照改”^[5]。但1911年清亡,学部的名词统一工作便无从继续了。

清末民初的很多译著,都在书末附有中西名词对照表,这些对照表可以说是一种微型的词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普及科学名词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比较畅销的著作,更是效果显著。然而,译著

及教科书后面的中西名词对照表,毕竟主要是编著者个人整理的,同一个出版社都很难使用同一套词汇,因此这些对照表在名词统一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在生物学名词的译介和统一方面,清末的各类辞典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英华萃林韵府》《生理学名词》等。此外,也有一些零星科学社团和个人的努力,如《农学报》上连载的《植物名汇》,《理学杂志》上刊载的《植物学语汇》等。不过,这些工作的影响都很有有限。博医会对于医学名词的统一做出了一些努力,其中包括少量生物学名词,都是跟医学相关的^[6]。

二 民国时期生物学名词的 审定与统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并没有及时设立专门的科技名词审定机构,早期的相关工作主要是由民间组织的医学名词审查会和后来的科学名词审查会完成的。尽管这两个名词审查会主要是由民间组织发起的,但也曾得到教育部的支持。教育部不但派人参加名词审查活动,而且还曾拨付经费,并将审查过的名词审定后向全国推广。除了两个

名词审查会之外,中国科学社等民间科技社团也积极参与了科学名词的审查与统一。直到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后,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才真正成为官方行为。

1. 两个名词审查会

1916年2月12日,在中华医学会召开大会之际,博医会、江苏省教育会、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分别派出代表组成医学名词审查会。1918年11月,教育部批准医学名词审查会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由此,科学名词审查会审查的名词范围由医学扩大到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

关于医学名词审查会及后来的科学名词审查会的详细情况,张大庆^[7]、温昌斌^[8]等已做过详细介绍。两个名词审查会有关生物学名词的审查活动,集中于1921年至1926年的第七到十二次名词审查大会^②,参与讨论的机构有博医会、江苏省教育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华医学会、理科教授研究会、华东教育会、中国博物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农学会、教育部等。每次讨论都分为动物学组和植物学组,分别由薛德焯、秉志、吴家煦等担任主席,审查了动植物学的名词、纲目属种的名词、遗传进化论术语等(见表1)。

表1 科学名词审查会有关生物学名词的审查活动

名词类别	审查会议次别	审查本	审定本
动物学:分类名词、解剖学术语、胚胎学术语	7、8、9		待印
植物学:术语及分类科目名词	8、9		待印
植物学:种名	9		待印
动物学:遗传学进化论术语、术语补遗、分科名词补遗、分科名词	10	出版	
动物学:哺乳类、鸟类种名	11	待印	
动物学:鸟类分类名词	12	待印	
植物学:种子植物属名	10	出版	
植物学:孢子植物属名	11	待印	
植物学:蕨类植物羊齿类属名	12	待印	
植物学:真菌类属名	12	待印	

注:表1参考温昌斌《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实践与理论》^[8]整理。

从表1可以看出,在科学名词审查会对生物学名词的审查工作中,一般名词审查的不多,种属分

类名词审查较多,进展比较缓慢。尽管每次审查大会都有几十人参加,但是具体到动物学组或者植物学组的人数就很少了。在1927年以后,科学名词审查会就没有再组织名词审查大会,已经通过审查或审定的生物学名词,较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版。直到1935年由鲁德馨编辑的《动植物名词汇编(矿物名词附)》由科学名词审查会出版,涉及经过教育部审定的动植物学名词和未经审定的矿物学名词。其中,植物学名词包括植物学术语及分类科目名词、植物种名卷一、孢子植物^③属名、蕨类植物分类名、真菌类植物属名等;动物学名词包括动物分类名、解剖学术语、胚胎学术语、遗传学进化论术语、动物分科名词、哺乳动物名(一部)、鸟类名词等。凡370页,合计10000余条,每条名词给出了拉丁名、英文名、德文名、参考名和决定名^[9]。

2. 国立编译馆

1928年成立的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逐渐完善了科学名词审定的组织与规章制度,但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名词审定工作。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均由该馆负责。国立编译馆属于教育部成立的政府工作机关,无论是组织建设还是规章制度都非常健全,这就使得名词审定工作得到了保障。

截至1949年,国立编译馆编审、教育部公布了一些与医学有关的免疫学、发生学、解剖学译名,尚

有大量生物学名词还处于已审定未出版或者未审定的状态。其中处于初审本整理中的包括:昆虫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植物组织学及解剖学名词;仍处于初稿编订中的包括:生物化学、细胞学、组织学、普通动物分类学、脊椎动物分类学、植物形态学、植物园艺学、普通植物分类学名词^[8]。

3. 科学社团——以中国科学社为例

正如两个名词审查会的运行一样,民国时期有诸多科学社团参与了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中国科学社就是一个典型。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在美国成立,其宗旨中即包括“审定名词”一项,社章规定设“书籍译著部”,认为“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10]。中国科学社在《分股委员会章程》中规定了厘定名词的工作原则,并要求社员译著、非社员投稿都要遵循该社厘定的名词。1915年中国科学社开始发行《科学》杂志,并为杂志配备了名词员;在杂志第2卷第12期刊出了《中国科学社现用名词表》。从1916年起,《科学》杂志开设科学名词论坛,由周铭、胡刚复、顾维精、张准、赵元任负责,刊登社内外有关科学名词的讨论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科学名词审定统一的必要性、翻译准则和译名统一方法、具体各个学科领域的名词翻译与审定等,其中涉及生物学名词的参见表2:

表2 《科学》杂志涉及生物学名词审定统一工作的文章

卷	期	题目	作者
2	9	万国植物学名定名例	邹秉文
3	3	植物名词商榷	钱崇澍 邹树文
3	8	植物名词商榷	吴元淦 钱崇澍 邹树文
8	7	遗传学名词之商榷	冯肇传
8	11	对于植物学名词之管见	岑铭恕
16	7	植物病理学术语及其解释	沈其益
18	12	昆虫译名之意见	杨惟义
24	3	昆虫之中文命名问题	陈世骥
30	3	streptomycin 中文译名之商榷	潘德孚

注:表2参考1915—1948年各期《科学》杂志整理。

1922年中国科学社第二次改组后,在学术组织机构中,设立了科学名词委员会。中国科学社有年会制度,在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中,有时也有一些关于生物名词的。如在1924年南京第九次年会暨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陈焕镛做了题为《中国植物名词商榷》的报告。另外,中国科学社成员编写了大量大学和中学生物教科书,如胡先骕、钱崇澍、邹秉文的《高等植物学》,吴元恊《高等生物学》,陈桢《普通生物学》《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等;此外,科学社成员秉志、胡先骕等还参与校订了很多生物学教科书。他们在编校教科书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生物学名词的翻译与统一,在书末都附有中英名词对照表。

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后,中国科学社从1919年开始参加,从第五次讨论会到第十二次讨论会都有出席。科学名词审查会解散后,中国科学社成员还参与过国立编译馆组织的名词审定。关于中国科学社参与科学名词审查会和国立编译馆名词审定工作的主要贡献,范铁权有较为详细的考察^[11]。

中国科学社在科学名词审定方面做出了较大成就,温昌斌认为,这得益于科学社的重视、成员的优秀科学素质、坚韧的吃苦精神、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的影响力^[12]。

民国时期,还有其他的社团组织和个人参与生物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如中华博物学会的《博物学杂志》曾经登出过审定后的植物学名词,1917年孙祖烈编纂了《生理学中外名词对照表》,1936年章熙林在《自然科学》发表了《古生物学译名草案》,1943年蒋涤旧在《中华农学会报》发表了《遗传学名词之译定及释义》,杜亚泉等人先后编出了《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辅仁大学农学系马条兹(Mathews G. B.)和郑葆珊合著《普通生物学名辞》,郑作新编辑了《普通动植物学名辞》等。

三 结 论

近代生物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经历了很长时间,其间有众多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参与。除了上面介绍过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如生物学

家和学校的生物教师关于名词的讨论、出版社和个人编辑的综合或专科辞典等,这些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物学名词的统一。

在生物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方面,有外国传教士的努力,更多的则是国人自己的耕耘,从政府部门到出版机构,从科学社团到独立个体,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名词的统一是学科建制化的重要一环,自然离不开学科的发展。当学科发展起来,有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大学和科研机构、专门学会和期刊,这个学科的建制化才趋于完善,这种条件下统一学科内的名词,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同时,名词的统一又会促进学科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生物学名词的统一过程在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民初之际,生物学名词的译介深受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掀起了西学高潮,翻译了大量西方生物学的书籍,编写了数量可观的近代生物学教科书。中日甲午战争后,大量国人留学日本,一方面学习日本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将日本的科学著作引介到国内。由于日本已经将生物学的名词进行了翻译,且大都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与语言习惯,因此经过日本人翻译的生物学名词也随之传入中国。尽管有一些发生了变化,大量的日译生物学名词还是被国人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生物学名词的统一。

科学名词的统一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且绝不仅仅限于某个学科之内,不同学科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科学家与社会之间更是不断互动。想要科学名词较快地得到大科学共同体乃至社会的认可与接受,政府的审定和颁行也必不可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生物学的相关学科都已经基本完成了建制化,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原国立编译馆的工作,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就公布了几十种名词。1985年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96年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的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也更加科学、规范了。

注 释

- ①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找到了此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题为《植物名词》。
- ② 1918年教育部批准该组织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更名后的工作,因此下文中只用“科学名词审查会”的称谓。
- ③ 即孢子植物。

参考文献

- [1] 王扬宗. 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J]. 中国科技史料, 1991, 12(2): 9-19.
- [2] 傅兰雅.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C]//黎难秋. 中国科学翻译史料.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6: 412-425.
- [3]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760-761.
- [4] 黄兴涛. 新发现严复手批“编订名词馆”一部原稿本

[N]. 光明日报, 2013-2-7(11).

- [5] 附录: 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J]. 教育杂志, 1910, 2(9): 25-30.
- [6] 张大庆. 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 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J]. 中华医史杂志, 1994, 24(1): 15-19.
- [7] 张大庆. 中国近代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 1915—1927[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6, 18(5): 47-52.
- [8] 温昌斌. 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实践与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42-51, 115-116.
- [9] 鲁德馨. 动植物名词汇编(矿物名词附)[M]. 上海: 科学名词审查会, 1935.
- [10] 例言[J]. 科学, 1915, 1(1): 1-2.
- [11] 范铁权. 民国时期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J]. 科学学研究, 2005, 23(增刊): 45-48.
- [12] 温昌斌. 中国科学社为统一科技译名而进行的工作[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 22(5): 86-92.

(上接第35页)

五 建 议

精确度不仅是测量专业学生和从业人员应该知道并会使用的重要名词,也是负责制定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有关人员应该掌握的重要名词。中国自1985年把乳制品检验方法列入国家标准以来,已经修改或整理了4次以上,但其中的术语使用仍不够完善,这涉及检验方法和标准的选用问题。这不仅使中国乳品行业“带病”生存多年,而且还影响了整个食品工业的健康发展。为了用最少的硬件投入来把好食品安全关,就必须先把“精确”知识贯彻到负责食品安全标准人员的头脑中,只有这个工作落实下去,“食品不安全”的阴影才能逐渐在中国人的头脑消失。

参考文献

- [1] 卫生部. GB 5413.22—2010 乳品安全国家标准[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0: 1-3.
- [2] ISO 9874:2006(E) /IDF 42:2006 Milk-Determination of total phosphors content-Method using molecular absorption [EB/OL]. [2013-05-08]. http://www.iso.org/iso/iso_catalogue/catalogue_tc/catalogue_detail.htm?csnumber=42702.
- [3] ISO 17997-2:2004(E) /IDF 29-2:2004(E) Determination of casein-nitrogen content-Part2: Direct method[S]. [EB/OL]. [2013-05-08]. <http://www.kuantianxia.com/biaozhun-standard/155-3.html>.
- [4] 费业泰.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4.
- [5]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01—1998[S]. 北京: 中国计量出版社, 1999: 2.